

超大型组织可持续发展的路径选择

——以百年中国共产党为例

郑崇明

摘要：超大型组织的可持续发展路径不同于常规组织的策略选择。基于百年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研究，发现三湾改编、古田会议和延安整风等典型的成功范例不仅帮助中国共产党取得了革命胜利，而且形成了丰富的组织经验根植于其记忆深处，并通过组织内部学习的方式形成路径依赖，为其不断发展壮大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量。百年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表明，超大型组织可能更加倾向于通过严密而非松散的组织结构，内部而非外部的组织学习来促进其可持续发展，进而为组织的可持续发展路径提供了新的选项。

关键词：超大型组织；可持续发展；路径依赖；百年中共

中图分类号：D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706 (2021) 03-0019-08

一、现象与问题

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已有百年历史。在过去的一百年里，中国共产党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持续发展。时至今日，中国共产党已经发展成一个拥有9000多万党员、460万个基层组织^[1]的超大规模组织。不管是经济组织、政治组织，还是社会组织，全世界似乎还没有第二个如此超大规模的组织。中国共产党不断发展壮大这一独特现象背后一定有着其内在的逻辑，因而值得从学术的角度加以高度关注。

一般而言，组织规模越大，管理的难度就越

大，付出的成本也越高。如果是政治性组织的话，组织规模过大不仅对国家财政支出产生影响，形成规模负累，并且伴随组织规模的扩大而可能愈发严重。^[2]事实上，在党的建设过程中，党员的思想素质、价值取向，以及行为规范的参差不齐等也曾给执政党治理带来各种困难。^[3]尽管这些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党内都或多或少存在，但从根本上讲，并未影响其不断发展壮大的趋势，即作为超大规模组织的百年中国共产党的可持续发展。

因此，本文的研究问题是：作为超大型组织的中国共产党在其可持续发展策略上与其他规模的组织有何不同？本文试图从组织学的角度，以

本文为广东省教育科学规划“十三五”项目“党内法规执行力研究”（2019GXJK041）；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党史特别委托项目“新时代社会治理现代化视角下深圳城市治理创新实践”（GD20TW05-03）阶段性成果。

百年中国共产党为例,探讨超大型组织可持续发展的组织行为及其路径依赖的形塑逻辑,以期组织的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理论贡献。

二、文献回顾与分析框架

从组织学的角度看,百年中国共产党的不断发展壮大,实际上就是组织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组织的可持续发展可以从斯科特对组织的界定得到比较全面的反映。在他看来,理性视角的组织是为寻求特定目标并且高度正式化的集体;自然视角将组织看成是为受冲突或共识推进的自寻生存的社会系统;而开放视角则将组织界定为根植于更大的环境下的不同利益参与者之间的结盟活动。^[4]通过上述三种定义可以发现,特定的组织目标与外部环境的支持构成了组织生存与发展的两个核心要素。因此,效率与适应性对于组织的存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在已有的研究中,组织主要采取松散结构和组织学习两种策略来适应外部环境,促进组织的可持续发展。

首先是组织的松散结构。从时间维度来看,组织的可持续发展包括两个方面,即对当下外部环境的适应和对未来外部环境的适应。前者是指组织,尤其是经济组织必须通过外部竞争赢得组织绩效的比较优势才能获得生存空间,即效率机制;后者是指组织如何被未来环境所接纳,并通过外部资源的输入获得发展机会,即合法性机制。然而,由于组织拥有的资源是既定的,效率机制和合法性机制对组织现有资源的消耗存在着此消彼长的紧张关系。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必须把内部运作和组织结构分离开来。^[5]一般而言,组织存在技术、管理和制度三个层次,其中技术层负责组织的效率目标,制度层负责组织的合法性目标,而管理层则负责协调技术层和制度层之间的张力。^[6]这一松散的结构安排有助于充分发挥效率机制和合法性机制各自的作用,对组织的可持续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

松散关联的组织结构对于增强组织对未来环境的适应性同样具有积极意义。如果一个组织内部结构关联松散,各个部门相对独立,那么,每个部门和单位都可以自我调节以适应环境变化。^[7]这种结构可以帮助组织适应不同的环境,允许组

织在不同方向上进行实验,甚至宽容变异。因此,“松散结构”有利于组织创新、有利于组织发展长期适应的能力。更为重要的是,在一个大的组织结构中采用“松散关联”的组织结构,不仅可以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而且能够鼓励小的组织在不同方向上的探索,进而提高组织在宏观上、整体上可持续发展的能力,^[8]比如松散结构的大学的寿命往往高于紧密结构的企业组织的寿命,其原因就在于大学教师与行政机构之间缺乏严格的组织约束,因而有利于大学教师进行自主的探索和创新。

其次是组织学习。在任何一个经济、社会和政治体系中,不论我们的社会制度设计得多么完善,任何组织都具有不断衰退的倾向,对于政党组织来说也不例外。如果组织不能有效地解决效率机制和合法性机制的问题,那么,组织成员可能发出退出和呼吁的信号,这意味着组织正在面临衰减的风险。^[9]因此,组织必须寻找有效的修复机制才能实现其可持续发展,而组织学习则是从“内部视角”进行组织修复的重要机制。组织学习的过程实际上就是通过信息接收,不断适应外部环境的过程。在彼得·圣吉看来,学习型组织在未来更具有竞争力。从学习的方向来看,组织学习既可以向外部学习,也可以在组织内部学习。外部学习主要是通过对与其他组织的模仿,而内部学习则是组织的自我学习,尤其是挖掘储存在组织中的历史信息,学习组织过去的经验。组织可以比个人更为有效地保留、积蓄经验教训和工业技术,可以把以前的经验教训在组织结构、组织规章制度中保存下来。^[10]研究表明,几乎所有的组织都能够从学习、掌握自己的历史信息中获益,不论组织历史长短,^[11]尤其是学习组织辉煌时期的成功经验更是被视为组织修复的重要途径。

通过已有的文献可以看出,组织的可持续发展的路径选择主要是从组织结构和组织学习两个方面入手,这些研究无疑非常深入且极具学术价值,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新的探索方向。然而,这些观点更多的是从组织的一般性角度来探讨的。事实上,不同的组织可能存在一定差异,比如组织的规模可能影响组织可持续发展的路径选择。

为此,可以从组织结构的松散程度和组织学习的方向两个维度建构一个不同规模组织的可持续发展分析框架。因此,组织结构的松散程度和组织学习的可操作性对不同规模组织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

虽然组织规模的大小并无统一的标准,但一般而言,主要包括小型组织、中型组织、大型组织和超大型组织。对于小型组织而言,可能更多的是通过强化内部结构,模仿外部优秀组织范本的方式来实现其可持续发展;对于中型组织和大型组织而言,其组织可持续发展策略在保持结构适度松散的同时,也更加注重吸取自身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以及强化外部学习;而对于超大型组织而言,其规模往往是独立无二的,其可持续发展不仅缺乏组织学习的参照对象,而且松散的组织结构可能导致组织内部缺乏紧密联系,而不得不强化组织结构的刚性。因此,超大型组织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路径选择上与其他规模的组织有其独特之处,即在上述分析框架中,超大型组织的可持续发展路径选择可能更多地倾向于组织内部学习和强化组织刚性结构来实行的。本文以百年中国共产党为例,阐述超大型组织可持续发展路径选择的内在逻辑。

三、来自百年中国共产党的经验证据

(一) 革命年代的组织绩效与组织记忆

在毛泽东思想体系中,党的建设被视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更进一步地通过党的建设,加强党的领导,是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的核心变量。这一核心变量所发挥的作用集中体现在三湾改编、古田会议和延安整风等成功案例上。

1927年,毛泽东领导湘赣边秋收起义后,部队在萍乡市芦溪镇遭遇了敌军袭击,减员高达三分之一,导致部队士气低落,士兵不断逃亡。毛泽东认为部队失利的原因在于共产党没有掌握军队。鉴于叶挺部队把支部建立在团上仍然经不起严峻考验的教训,毛泽东在“泰和祥”杂货铺组织召开了前敌会议,即三湾改编。三湾改编确定了把党的支部建在连队上,班、排设立党小组,连以上设党代表,营、团设党委。把支部建在连

队上保证了党在政治上对军队的领导。正如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所言,“红军之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特别是在连一级,因党的支部建设在连上,党代表更为重要……事实证明,哪一个连的党代表较好,哪一个连就较健全”。把党支部建在连队上,实际上是从组织的角度,把党的力量嵌入到军队的组织结构中,从而强化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实现了党组织和军队在结构上的紧密结合,一改党组织与军队之间的松散结构。三湾改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军队的第一次成功尝试,为中国共产党不断发展壮大积累了初步的经验。

井冈山会师后,部队和党组织内加入了大量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同志,“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包括“单纯的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化、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等,毛泽东指出,“种种不正确思想的来源,是由于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的”。^[12]为了纠正军事政治对立、军队只是单纯地打仗等的错误思想,1929年12月,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上杭县古田召开,即古田会议。古田会议强调要通过从教育上提高党内的政治水平,肃清单纯军事观点的理论根源,认清红军和白军的区别,强调“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使得军队“完全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使得整个中国红军完全成为真正的人民军队”。古田会议的思想建军比三湾改编更进一步,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进一步强化了党组织与军队的紧密结构。

如果说三湾改编和古田会议仅仅是从军队层面上加强党的领导的话,那么,延安整风则是中国共产党对政治、经济、军队和社会全面领导的开始。加强党的领导,前提是加强党的建设。在某种意义上讲,延安整风运动是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最为成功的党建典范,是全党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其主要目的是清算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在党内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左”倾错误路线及其表现形式主

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13]1938年后,一些留苏学生被提拔到中共中央的领导岗位上。留苏学生一多,弥补了过去党内理论基础薄弱的欠缺,但同时也带来了教条主义盛行的问题。^[14]皖南事变的教训就是没有把普遍真理的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联系起来,甚至不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不了解经过十年反共的蒋介石。^[15]因此,

“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中指出,要“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16]并特别强调要增强党性,提出全党要“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统一纪律”,“造就一个真正思想统一、行动统一的党”,并最终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组织机构与党的纯洁性。延安整风运动“通过在全党范围内召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活动进行整风,巩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在党内外的阵地,使广大干部在思想上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使中国共产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17]也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夺取新民主主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组织严密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政治优势(张立伟,2019)。尽管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建立起了结构严密、功能清晰、分工明确的组织体系,但其组织体系及其制度的真正完善实际上是在延安整风时期完成的。通过延安整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确定了毛泽东的核心领导地位,在健全党的组织体系的同时,加强了党对政治、军事、社会、文艺等方面的全面领导。延安整风不仅为中国共产党夺取革命胜利做了最好的组织准备,而且为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后长期执政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总的来讲,三湾改编和古田会议确定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其中三湾改编从组织上保障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古田会议确定了思想建军的基本原则,而延安整风则实现了党对一切工作的统一领导和统一行动。这些成功范例所形成的经验经过时间的沉淀,根植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记忆深处,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信息库。在这个信息库里,储存着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以及意识形态、民主政治、群

众路线、统一战线、运动式治理、集中力量办大事等治党、治军和治国的丰富经验。

(二) 和平年代的组织学习与往事力量

革命年代的历史辉煌是储存在中国共产党内的组织记忆。组织记忆是那些源于组织历史并且能够影响组织决策的存储信息,^[18]是将过去知识运用于当前活动,从而导致组织效率水平变化的一种方式,^[19]以寻求竞争优势的组织行为。^[20]这些组织记忆为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后长期执政储备了丰富的组织资源,在某种程度上,延安经验几乎勾勒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模式的轮廓。

如前所述,组织学习包括组织外部学习和组织内部学习两种。作为超大型组织的中国共产党,特别是在苏联解体之后,其在可持续发展上的问题几乎没有横向学习的参照对象。因此,学习中国共产党过去的成功经验,就成为其不断发展壮大和长期执政的重要选择。改革开放以后,历届领导人要么重温革命经典,要么前往革命故地,期望通过激活组织记忆,重新整顿组织,加强党的领导,为完成新的阶段性任务提供理论来源和发展动力。

新中国成立后,在学习苏联模式的基础上,开启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建设之路。在这期间,中国共产党几乎沿袭了革命时代的做法,通过加强党的建设,发动群众运动等方式进行了艰难曲折的社会主义探索。但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加之外部环境的恶化,中国经济社会几乎陷入停滞状态。1978年,中国开启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之路。如何进行改革开放是摆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现实问题,既没有历史的经验,也没有可供学习的对象。1980年,邓小平在《贯彻方针调整、保证安定团结》的讲话中强调,“搞社会主义建设,实现四个现代化……一定要宣传、恢复和发扬延安精神”。“完整的党建学说是经过时间在延安整风时期建立起来的”,^[21]是毛泽东思想党建学说的生动体现。1983年11月,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要求“这次中央权威的主要议题是整党……整党不能走个过场……要通过整党,加强党的建设,实现党风的根本好转”。^[22]整党

最成功的经验莫过于延安整风。因此,学习延安精神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之初加强党的建设的自觉选择。经过从中央到市县再到农村近五年的持续整党,党组织的纯洁性和思想的统一性得到了显著提高,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党中央领导集体,为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提供保障的同时,也为其可持续发展奠定了政绩合法性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与经济快速增长相伴的是社会财富分配发生了变化,农村社会阶层比例的增减,掌握社会大量财富的私营企业主不仅发展迅速,而且已经进入中国社会阶层结构中的上层,但他们的地位没有得到社会和政治的认可。^[23]这是摆在无产阶级性质的中国共产党面前的新问题。在《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江泽民提出了党的建设新思路,“不仅要求党员在组织上入党,而且要求党员首先在思想上入党”。事实上,“从思想上入党”是毛泽东在古田会议上提出的解决红军内部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有效做法。在延安整风时,毛泽东针对“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的情况,要求“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可见,古田会议和延安整风中的“从思想上入党”这一经验在新的历史背景下被复制。“从思想上入党”的做法,顺应了转型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外部环境的变化,通过吸纳新兴阶层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其可持续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江泽民在考察古田和延安时指出,“古田会议决议是个宝,至今还有强大生命力,要温故知新,学而时习之”,“延安精神体现了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延安精神都不能丢,全党同志,一定要结合新的实际,大力弘扬延安精神,使延安精神成为我们党在新世纪团结和带领人民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强大精神动力”。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在意识形态的感召力式微、法理资源相对匮乏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在很大程度上转而依赖于通过对政

绩的追求来获得合法性基础。但是,片面追求经济发展的政绩观导致了社会发展的不协调、政绩工程泛滥、政绩困局的出现等一系列弊端。^[24]这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国共产党自改革开放以来建立起来的政绩合法性基础,不利于中国共产党的可持续发展。2003年,胡锦涛在《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中指出,“要把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作为新时期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内容”。这意味着脱离群众的政绩观正在削弱党的权威。2006年,胡锦涛在考察延安时强调,“我们坚持和发扬延安精神,很重要的就是要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实际上,求真务实与实事求是是一脉相承的。1938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报告中指出:“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又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因为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只有远见卓识,才能不失前进的方向。”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对实事求是进行了阐述,“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只有实事求是,才能规避片面的政绩观,树立科学的政绩观,为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建设更是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中心工作。在党的十八届一中全会的记者见面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党内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尤其是一些党员干部中发生的贪污腐败、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必须下大力气解决”。^[25]党员干部越来越脱离群众,腐败盛行,严重背离党的性质和宗旨,严重影响了党的执政地位。习近平总书记曾先后到延安、井冈山等革命圣地考察,反复强调要让红色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告诫全体党员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掀起了新一轮的反腐败斗争高潮。在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下,一大批贪腐官员纷

纷落马。与此同时，党中央先后开展了“群众路线”中央八项规定“两学一做”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等活动，其中“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更是以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为重点，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发扬革命传统和优良作风，团结带领人民把党的十九大绘就的宏伟蓝图一步一步变为美好现实，^[26]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和实现党的十九大确定的目标任务。经过不懈努力，不仅反腐败压倒性优势已经形成并巩固发展，迎来了廉洁拐点，^[27]而且“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也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提高了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知行合一的能力，增强了守初心、担使命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消除了一些可能动摇党的根基、阻碍党的事业的因素”。^[28]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建设在很大程度上是延安整风在新时代的重现，延安精神被组织重新激活，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学习和复制。

总的来讲，中国共产党已经发展成为一个走过百年光辉历程、在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执政70多年、拥有9000多万党员的世界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通过中国共产党在其组织可持续发展策略的梳理，不难看出，中国共产党这一超大型组织不论在任何时候，都特别强调组织的纯洁性，并将思想统一和行动统一贯穿到庞大而严密的组织结构中，形成强大的组织权威。同时，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对其历史上成功经验的学习，并形成路径依赖。每当其可持续发展受到挑战的时候，总是通过反复挖掘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记忆，不断强化对历史成功经验的组织学习，重新把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组织起来，进而调整国家治理系统，为中国共产党完成特定阶段的使命和任务提供发展动力，最终推动其可持续发展。从组织学的角度来看，中国共产党通过组织学习不仅重塑了组织的权威性，提升了组织的有效性，而且激活组织记忆，彰显组织的合法性。

四、结论与讨论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特别注重组织学习，尤其注重学习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

成功经验。作为一个超大规模的百年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轨迹呈现出内生性过程，即通过不断学习其历史经验和失败教训，激活组织记忆，进而为新环境中的政党完成组织历史使命提供发展动力。在中国革命与国家建设的每一个重大关头，中国共产党在很大程度上都会重温历史，不断总结经验，结合当下的主要任务，通过党的建设（整风、整党）来加强党的领导，不断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建构新的理论体系，进而推动各个时期目标的实现。在顾立雅（H.G. Creel）看来，人们早已意识到，中国对世界文明的贡献远不止于造纸和火药等发明创造。^[29]大规模的复杂组织是当代社会的突出特征，在这个方面，中国有重要贡献。为此，本文从组织的学科视角，基于百年中国共产党的分析，尝试提出超大型组织可持续发展的两个基本命题。

命题一：超大型组织在其可持续发展策略上的组织结构并不是松散的，而是严密的。

组织社会学的观点认为，组织的存续需要效率机制和合法性机制共同发挥作用。组织的效率机制解决的是组织对当下环境的适应，组织的合法性机制解决的是组织对未来环境的适应。当组织的效率机制与合法性机制发生冲突时，组织通过结构调整来缓解二者之间的张力，一般的做法是组织的基层负责效率机制，组织的高层负责合法性机制，组织的中层则负责协调基层与高层之间的关系。为此，组织往往通过松散的结构来缓冲效率机制与合法性机制之间的张力。此外，松散结构也为组织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探索未来的机会。

但从中国共产党这一超大规模组织来看，其在可持续发展方面采取的策略，不是松散的组织结构，而是刚性的组织结构。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日起，就建立起了严密有序的等级制组织制度，在自上而下的漫长链条中形成权力集中、层层节制的组织结构和制度配套；另一方面通过建立统一严密的、接受中央权威的观念制度体系，通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执政党内部观念，形成以“一统体制”为中心的、维系中央权威的共享观念制度，进而保障中国共产党在精神层面的纯洁性、

革命性和统一性,在政策执行层面做到令行禁止。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更是通过建立基层党组织,将组织权力直接延伸到社会末端,建立起了一个庞大而严密的组织体系。^[30]无论是在立法、行政、司法、军事等组织机构,还是工厂、农村、街道、社团等社会单位,党的组织纵向到底、横向到边。它不似一般规模的组织,通过允许异端的存在来探索未来的方向,帮助组织实现可持续发展。相反,中国共产党更多地强调党的领导核心,通过党的建设来加强党的纯洁性,以此保证全体党员在思想上、行动上都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此外,在效率机制和合法性机制的调试上,超大型组织更多的是周期性地切换常规治理和运动式治理,而不是在组织的制度层、管理层和技术层的协调来缓解效率机制和合法性机制之间的张力。

命题二:超大型组织在其可持续发展策略上更加倾向于内部组织学习而非外部组织学习。

任何组织,都必须考虑组织的可持续发展的问題。一般而言,组织的可持续发展往往通过目标替换、组织学习等方式实现。组织学习是组织获得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但超大型组织是一个少数现象,它几乎没有通过外部学习的参照对象,也没有组织趋同的制度环境^[31]来获得模仿机会。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百年大党。在当今世界,中国共产党在组织规模和组织结构上几乎是一个独一无二的现象。因此,组织的内部学习往往成为超大型组织可持续发展策略的路径依赖。如前所述,组织储存着大量的历史信息,组织过往的辉煌往往对于组织的未来绩效发挥着重大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在革命与执政的每一个关键节点,几乎都是通过重温过去成功辉煌来唤起组织发展的动力。一旦唤醒组织记忆,便为组织在新的环境下完成新的历史使命提供了发展动力。比如在转型社会治理中,基层党组织就借鉴了革命年代把支部建在连队上的做法,实施了把支部建在网格上,把支部建在家门口,把支部建在工地上,把支部建在项目上等举措。再比如,改革以来形成的独具中国特色的地方政策试验的国家治理模式实际上就是源于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分

散的根据地的工作方法,即“游击式的政策制定方法”。^[32]这种分散探索的治国方略不仅降低了组织的系统性风险,而且能够更加有效地提高组织对外部环境的适应力。

组织的可持续发展是组织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不同规模的组织在其可持续发展上可能有着不同的策略。本文着眼于中国共产党这一超大规模组织,从组织结构和组织学习两个维度,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加强党的建设和党的领导,将其打造成为一个严密而非松散的组织结构,更加强调内部学习而非外部学习的路径依赖,有效地促进了其可持续发展。在某种程度上,从组织学的视角回应了中国共产党的何以长期执政的问题。最后,从学术研究的规范性来看,上述命题仅仅是基于中国共产党的个案分析。从一般意义上讲,上述命题是否同样适合其他超大型组织的可持续发展,还需要获得更多的经验支持和理论检验。当然,中国共产党的可持续发展同时还受到其他诸多因素的影响,而不仅仅是组织结构和组织学习两个方面。此外,对于超大型组织而言,其组织学习除了学习其成功的经验之外,也会学习其失败的教训,通过强化经验教训来规避未来的陷阱。

参考文献:

- [1] 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超 9000 万 [N]. 人民日报, 2019-07-01.
- [2] 范旭阳. 组织规模与“大政党病”[J]. 领导文萃, 2013, (20): 109-112.
- [3] 齐卫平. 政党治理视角下执政党组织规模问题的思考[J]. 江汉论坛, 2014, (7): 12-15.
- [4] [美]W. 理查德·斯科特 [美]杰拉尔·德·F·戴维斯. 组织理论: 理性、自然和开放系统[M]. 高俊山,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31.
- [5][7][8][10] 周雪光. 组织社会学十讲[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104, 324, 449, 449、434.
- [6] [美]詹姆斯·汤普森. 行动中的组织: 行政理论的社会科学基础[M]. 敬义嘉,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序言.

[9] Albert Otto Hirschman (1970) Exit, Voice, and Loyalty. Responses to Decline in Firms, Organizations, and States [J]. 1968, 11(1):69-75.

[11] Berthon P, Pitt L F, Ewing M T. Corollaries of the collective: the influence of organizational culture and memory development on perceived decision-making context [J]. Journal of the Academy of Marketing Science, 2001, 29(2): 135-150.

[12] 关于纠正党的错误思想 [M]//毛泽东选集 (第一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85-96.

[13] 胡乔木回忆延安整风 (上) [J]. 党的文献, 1994, (1): 37-48.

[14][15] 杨奎松. 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的台前幕后 [J]. 近代史研究, 1998, (4): 1-23.

[16] 整顿党的作风 [M]//毛泽东选集 (第三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811-829.

[17] 改造我们的学习 [M]//毛泽东选集 (第三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795.

[18] Walsh, James P. and Ungson, Gerardo Rivera. Organizational Memory.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91, 16(1): 57-91.

[19] Eric W. Stein, Vladimir Zwass. Actualizing Organizational Memory with Information Systems [J]. Information Systems Research, 1995, 6(2):85-117.

[20] Tuomi, Ilkka. Data Is More than Knowledge: Implications of the Reversed Knowledge Hierarchy for Knowledge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al Memory [J]. Journal of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 16(3):103-117.

[21] 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 [M]//邓小平文选 (第二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44.

[22] 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 [M]//邓小平文选 (第三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36-48.

[23]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农村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 [EB/OL]. http://www.china.com.cn/zhuanti2005/txt/2002-02/05/content_5105065.htm.

[24] 倪星. 政府合法性基础的现代转型与政

绩追求 [J]. 中山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6, 46(4): 81-87.

[25] 习近平在新任政治局常委与记者见面会上发表讲话 [EB/OL]. <http://news.12371.cn/2012/11/15/VIDE1352953681461457.shtml>.

[26] 习近平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EB/OL]. http://www.xinhuanet.com/2019-06/30/c_1124690900.htm.

[27] 倪星, 张军. 廉洁拐点的地方经验与政策意涵——基于G省廉情评估调查数据的分析 [J]. 政治学研究, 2018, (5): 39-53.

[28] 习近平: 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的讲话 [EB/OL]. <http://www.12371.cn/2020/01/08/ARTI1578484693202865.shtml>.

[29] H.G. Greel, The Beginnings of Bureaucracy in China: The Origins of the Hsien [J].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964.

[30]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优势和组织特征 [EB/OL]. http://www.qstheory.cn/llwx/2020-03/05/c_1125665777.htm.

[31] Meyer J W, Rowan B. Institutionalized organizations: Formal structure as myth and ceremony [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77, 83(2): 340-363.

[32] 韩博天. 红天鹅: 中国独特的治理和制度创新 [M]. 北京: 中信出版集团, 2018: 20.

作者: 郑崇明, 深圳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深圳大学党内法规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

责任编辑: 熊哲文